頭頂上的摩登：日治時期的台灣帽子

苗延威 （政治大學社會系）

研究主旨

若說台灣的現代性認同誕生於摸索與迷惘之中，那麼，模仿巴拿馬草帽的大甲帽／林投帽，既滿足了形式上的「鏡中自我」，也擺脫了其他殖民現代性指標物件往往要求的階級條件，讓每個剪辮後的男子，都有機會以低廉的價格和極具在地色彩的材料，佩戴著**「現代」/「全球」**的標幟。於是，仿戴西式草帽固然模糊了**「西方」與「東方」**的邊界，卻也使得大甲帽同時擁有**「舶來品」與「土特產」**的二元特性。1911 年 12 月 18 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了幾則「廣東近信」（發出日期為 12 月 8 日），這是一位日本人寄至台灣的訊息，其中提到了當地的剪辮風潮以及帽子熱賣的情形，中譯如下：

> 這陣子以來，此地人們想要剪除滿奴辮髮的需求量很大，有些理髮店家還會主動上街，巡迴提供免費剪髮的服務。不過，也有不願逕行斷髮的老人家，由於被人們拖著的要替他們剪髮，結果上演了有如鬧劇一般的拉扯場面。斷髮之後，頭頂重量頓時減輕，人們會戴著**鳥打帽**以調適心情，一時之間，帽子銷量奇佳。香港因為缺貨，帽子價格被烘抬了數倍之高；**日本內地的帽子製造業者，甚至出現訂單排到明年春天的盛況**。貴地出產的**台灣巴拿馬**，亦不該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商機。」

相關的歷史脈絡：

1. 廣東軍政府成立於 1911 年 11 月初，這封信所說的，正是中國政體與政權正在轉移之中的廣州街景。(同年 11 月 16 日的報導也提及福州的類似狀況）
2. 所謂「剪髮」、「斷髮」、「斬髮」，其實都與「剪辮」同義，只表示剪斷滿族式樣的髮辮，而不意味著一系列的「理髮」流程，因此斷髮之後的「髮式」，可能就是原來的前頭頂薙髮加上後頭頂的及肩（或及頸）披髮。
3. 文中的「貴地」有可能是泛指台灣，也可能是收信人所在地的台南。
4. 信中所說的「鳥打帽」（中文直譯為「打鳥帽」，英文為 hunting cap），即我們俗稱的鴨舌帽。至於「台灣巴拿馬」（台灣パナマ）本指台灣特產的林投帽，是由林投樹葉纖維編製而成的帽子，不過有時也泛指台灣生產的各式草帽，簡稱為「台灣帽子」，包括藺草編織的大甲帽，以及以麻類纖維為主原料的紙帽；取名為「台灣巴拿馬」，則是因為這個帽子的型式與西方流行的巴拿馬草帽相似。

- 隨著辛亥斷髮風潮而來的，是**一股重新審視和治理身體外觀和裝束的社會**

驅力，而這樣的集體心理需求帶動的裝束變革，背後所突顯的社會意含，值得思索與分析。

- 例如，剪辮的經濟負擔問題雖然並不明顯，何況還有理髮店願意巡迴提供免費服務，但是「**易服**」就不同了，富人階層固然沒有這層顧慮，對平民百姓來說，這卻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 與前述廣東街市報導約莫同時，在廈門的日本人眼裡，易服改裝的強大集體需求，同樣使得西洋服飾鞋帽成為消費大宗，連當地軍政府貼出勸戒告示都遏止不住：
- 「自前月起，廈人剪髮日盛，因之改粧者亦日多，故**洋帽洋服洋靴等物，自香港運入者，幾無船不有**，但以**得時之物**，爭購者眾，價格遂蒸蒸日上。**現每人改裝之費，計須四十元以上方能齊備**。**軍政府雖出示勸戒，剪髮不必易服，以保漏扈，然勸者自勸，而易者仍易也。中戶以下，固無力改裝，中戶以上，則購辦洋服飾者，每以兩襲為例。**計其耗費，當在近百金之譜也。以此知廈人此次利源之外溢，當非細數也。」(《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2 月 25 日，「廈門通信／利源外溢（十九日發）」。）
- 日本駐湖南的一位外交官員（副領事）甚至特別發了一份報告，指出長沙街頭因「斷髮厲行」，鳥打帽和皮鞋隨之銷路大開（12 月 17 日，「長沙斷髮流行」)。
- 類似報導亦見 1911 年 12 月 3 日，「洋帽暢消」。

中國自辛亥斷髮之後，草帽的巨大需求量撐起的市場，原以進口的舶來品為主力，直到 1910 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觀：

> 「革命後人人剪髮，一時流行之草帽，大半取諸舶來。雖有設廠製造，如冠華、大東諸廠者，然購者寥寥生意，不見十分發達。近自勸用國貨以來，一般人士，均以置用國貨，為一時之漂亮。際此赤帝當柄，烈日炎炎，而支那自造之草帽生涯，遂有一躍千丈之勢。近聞業草帽者，三年存貨，一旦告罄，雖已加工趕造，而來者源源，幾無以為應云」(1915 年 7 月 17 日，「支那之綿紗與草帽」)。

「**現代性配件**」(accessories to modernity)：

- 剪斷髮辮、改換西服成為「邁向現代」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象徵著自我認同的與時並進；借用 Susan Hiner（2010）的概念，短髮與西服因而都算是一種「現代性配件」。
- 前引報導的西服市場榮景也說明了西服／洋服正是二十世紀初襲捲全球的「流行時尚」。然而正式的三件頭西裝所費不貲，一般人不易購置，但是**具有西服意含的草帽，則提供了廉價的配件，恰可滿足「佩戴」現代性的想望**。
- 在日治時期，「大甲帽」是台灣重要的外銷品，輸出地以神戶和上海為主，**全盛時甚至佔外銷產品的第三位**，僅次於米和糖，並曾多次參加國際展覽（包括巴拿馬博覽會），以傲人的手工藝術面向「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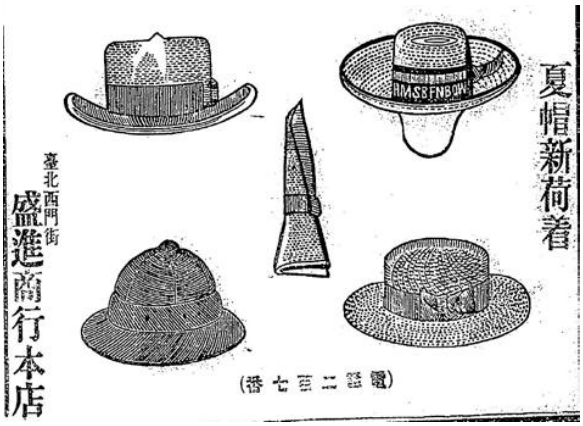
- 然而，「草帽」概念並非台灣本土自有，它與日本岡山縣的麥桿工藝有關：1872 年**岡山淺口市人**河田谷五郎挪引外國草帽而製成「麥桿帽」/「麦稈真田」。

上：東京百貨公司販售麥桿帽/巴拿馬帽的廣告
右：日本岡山縣的麥桿帽及其纖維材料
(source: http://www.tamabi.ac.jp/ idd/shiro/light/renoir/renoir.html)

- 日本的草帽文化，似乎又與十九世紀**舊金山淘金熱、美國鐵路建設與巴拿馬運河開鑿時期**，大量來自中南美洲的工人階層習慣戴的草帽在歐美造成大流行的時尚風格有所關連（即所謂的「巴拿馬帽」，原產於厄瓜多爾，因巴拿馬為輸出集散地而得名），可說是一項由「全球」引領地方的文化思維。
- 不過，全球貿易史與文化交流史在大甲帽產業研究裡，儘管饒富意義，卻未曾受到關注，因此本研究希望在這個議題上有所突破。

舊金山礦工的勞動狀態， 1849-50
Published at the WIDE WEST OFFICE, 184 Clay Street, San Francisco
(source: http://www.sfmuseum.net/views/goldrush.ppt)

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視察巴拿馬運河後返美，手持巴拿馬帽向群眾招手的照片，1906。
(Source: http://www.delmonicohatter.com/Merchant2/graphics/00000001/static-pages/panama-hat-teddy-roosevelt.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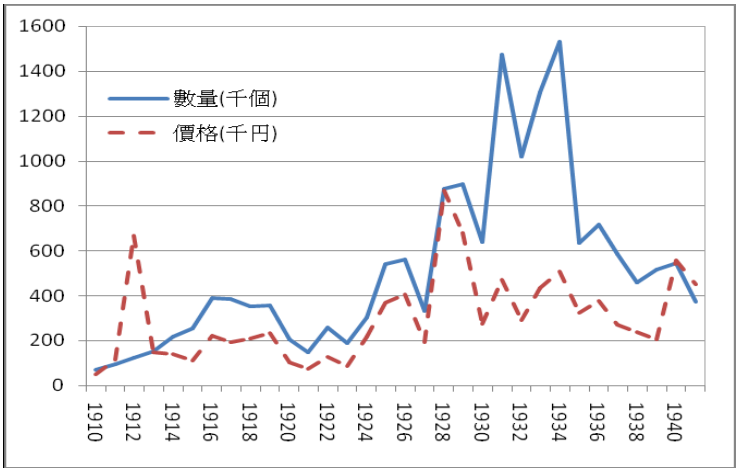


1900 年代初的草帽名稱與製作材料各有不同，頗易混淆，「大甲帽」、「苑裡帽」以大甲藺製成，「淡水帽」則為林投葉，此外另有以棕櫚葉製成者而未見其名：

「**大甲帽**製造，以大甲為主產地，向來相繼輸出各處，消售極見多大。然近時需要額甚減，即如價格，亦相繼低落，實不振之現象也。**內地人岡田**者，<u>仍用此帽材料</u>，別運意匠，欲以投世人之嗜好，遂得一種之新案特許，製成**新式夏帽**，蓋所謂**苑裡帽**是也。此帽一出，世人甚爭好之。今也其製造盡力，製成之帽，已散見于臺北市中店頭，謂之為露西亞形也亦可耳。即如其價，**最廉者自六七十錢、一圓二十錢、四十錢，最高亦不過二圓左右而已**。此新案之帽，固屬最近之時，而其所製出者，已達二萬個。此外尚有各地定做，其需要額到底有不能充之勢焉。<u>**今尚有製出一種之巴拿馬帽，此亦係是新案之者其帽與向來之淡水帽相似，而異其質**</u>。**淡水帽**以林投為材料，而此則以**棕梠葉**之纖維者，晒而編成，比之林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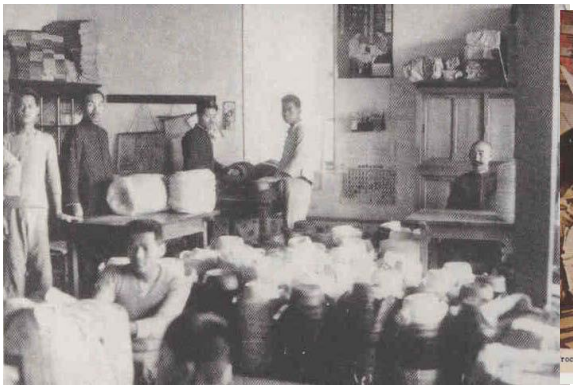
大有彈力，得以永久不敝也；然迄今此帽，亦纔製出百數十個而已耳。」 (1907 年 8 月 25 日，「苗栗廳下製帽近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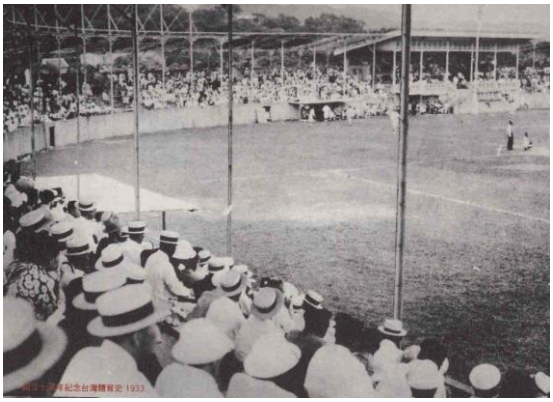
- 大甲帽的源起，據說是在 1897 年，苑裡辦務署署長**淺井元齡**（日本岡山縣人）發現當地婦女洪鴦的藺草編蓆技術優異，要她試編草帽，效果極佳，便進一步要求她教授其他婦女編織草帽。



1910-1940 年間，台灣帽子的產量及價格（重製自小池金之助，《台湾帽子の話》，1943：4）

- 其後更開始將藺編草帽商品化，由大甲商人推銷到日本，當時日本本土對於夏帽的需求量頗高，帽商得以順利拓展這項產品，台灣的草帽產業於是蒸蒸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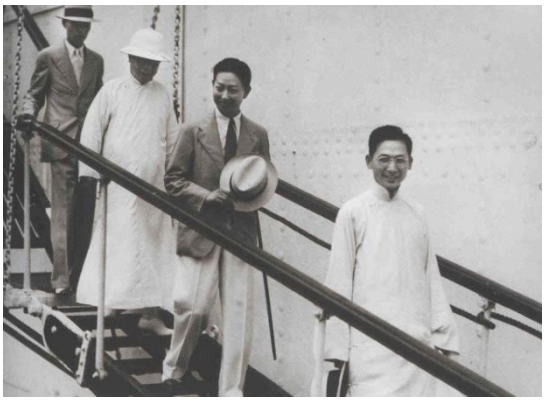




- 由於大安溪下游聚落的婦女本已熟悉藺編工作，尤其是苑裡婦女的編蓆技藝早已名聞遐邇，草蓆販子都願意出較高的價格來收購她們的貨品，《苑裡志》的作者蔡振豐（1897：115）還特地寫了一首〈苑裡蓆歌〉來描寫

她們的生活：

> 苑裡婦，一何工，不事桑蠶廢女紅。十指纖纖日作苦，得資藉以奉翁姑。食不知味夢不酣，**人重生女不生男**。生男管向浮梁去，生女朝朝奉旨甘。今日不完明日織，明日不完繼以夕。君不見，千條萬縷起花紋，織成費盡美人力。



- 「目下大甲之製造帽子者，到處皆然，無家不有。**其女工之上者，一日可得四五十錢，中者可得貳參十錢，下者亦可得壹貳十錢之工資。每年賣出之收入金，不下十萬餘圓之巨額**，噫可謂盛哉」（1905 年 7 月 12 日，「大甲帽製造之盛況」）
- 學習編織草帽並不困難，因而紛紛投入藺編外銷市場，在「重生女」的苑裡，**女孩於十二、三歲時，即開始學習藺編，「始學時，或二日製一帽，十餘日製一蓆」，每天即有一、二十錢的工資，至「成人藝成之日，一日可得製造資數十錢，或至一圓」**。
- 在當時，只要家中有人從事帽蓆的編織，就夠維持整個家庭生計，因此，苑裡婦女的「聘資必加厚；而為婦女者，亦以此自命，不能以手藝助夫成家，不敢嫁也」，而且也因這項特產，使苑裡這個「窮鄉僻壤之邑，登於席豐履厚一途」(《1906 年 7 月 10 日，「苑人植草之言」
- 大甲帽市場的崛起，使得**苑裡婦女的勞動產值和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然而她們並未因此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根據一些口述歷史的記載，蓆編技藝反而苑裡婦女的生活更加忙碌辛苦**。
- 至於編織草帽的勞動場所，由於婦女們仍需顧及家務勞動和農務工作，因此草帽編織以自家為主，趁農閒時或是白天農務工作告一段落之後的餘暇才能從事編織。
- 她們有時甚至需要在夜間趕工，最初僅能藉著燭光工作，後來，到了 1912 年，**草帽單價高漲的年代，大甲一帶因為帽蓆產業利潤可觀，連帶使得該地成為中部早先供電的街庄**；除了自家之外，一些帽蓆商會亦設立專門教授編織技術的工場，尤其在帽蓆商社聚集的大甲地區為多。
- 大甲帽產業在戰爭時期因為國際航線斷絕等因素，外銷停頓，轉為內銷，並成為國家軍需工業的一環，製作**軍用夏帽**。
- 為了挽救出口下滑的困境，日本政府曾試圖推行若干輔導措施，包括成立「台灣帽子興業株式會社」、「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等團體，並廣辦講習課程、舉辦展覽會、進行市場調查、向外國進口商宣傳、參加國際貿易商展覽會等等，**因此在 1941-42 年的惡劣國際局勢之下，台灣帽子仍能外銷 258 萬頂，苑裡草帽的產值甚至高達一百萬圓之多**。

- 小池金之助在《台湾帽子の話》（1943）裡即收入了數張「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前往泰國等東南亞地區推廣台灣帽子的海報。

Hiner（2010）以「現代性配件」（accessories to modernity）的概念解讀**十九世紀法國女性時尚配件**，將之視為具有關鍵地位的現代性象徵。在她看來，**這些用以表達優雅品味的服飾物品——絲絨、開什米爾羊毛、珠寶、蕾絲、扇子等等——其運作邏輯乃是鑲嵌在帝國擴張、文明禮儀要求、加速的社會流動、性別化與階層化的社會實踐、商品文化，以及名媛貴婦身兼消費者與社交附屬品的弔詭位置之中**，因而**調和了異國情調與端莊優雅、流行商品與精緻藝術之間的距離，又不失其「配件」的屬性，使得配戴它們的女性，既是展示「現代性」的主體，又是被展示的客體**。 (Hiner, Susan. 2010. *Accessories to Modernity: Fashion and the Femin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P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呈現物質幽微屬性的文化操作**，必須**以人與物之間的一連串互動過程為根基，從注視、言說、編織、觸摸、閱讀、品嘗、修護等等文化行為中釋放出某種「物的質素」**。
- 參與互動的諸多行動者，在成就這些「物的質素」時，已不單單是在「使用」某個商品，如 Dant（2009）所說的，**這個程序與其說是消費，不如說是再製， 而這種透過與物質共存以釋放與轉化其內在意義的行動， 即為挪用（appropriation）**。(Dant, Tim 著，2009。《物質文化》，龔永慧譯。台北：書林。)
- Dikötter（2007）便將清末民初中國民間對待各種新鮮的「洋玩意」的方式，包括無止盡的傳散、拼湊和模仿，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全球性。
- 他更強調，洋貨會在生活世界裡遭到種種「**創造性的挪用**」（creative appropriation），因此物質文化的進口，不可能是全然被動的「灌輸」，而是**一種意義仿生、轉譯和誤譯的過程**。(Dikötter, Frank. 2007.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如 Sahlins（1996）所說的「現代性在地化」（indigenization of modernity）：**全球的同質性與地方的歧異性，始終是並存的，因為地方文化就是具有解編與重編符碼的能力**。 (Sahlins, Marshall. 1996.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像日治台灣這樣的殖民地，體驗到的是一種**「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同時具有資本主義化的工具理性，又具有殖民主義式的物質文化挪移與生產／消費依賴關係**。
- 殖民現代性傾向**卸除傳統符碼，拼裝帝國符碼**，所以在感官屬性較強的文化技術層次上，可以達到快速「裝潢」的目的，讓人輕易地就**看得到、聽得到、吃得到、聞得到、摸得到象徵著「新時代」的物質性**（materiality）。
- 這些**感官文化，又交織成為一幅「自成一系」的歡愉經驗和品味**，例如飲食、服飾、空間、移動、音樂、繪畫等等，召喚著個人在某個部分產生相應的認同。而**物質性的、感官性的召喚，又不可避免的要以身體為媒介，進行著不同於傳統體驗的消費和刺激**。
- 就像 Appadurai（2009: 96）指出的，即使是最具有流行特性的消費形態裡，重複或習慣化都是消費活動最重要的特質。這**種因為身體的要求而產生的慣性，反過來又促使感官商品以細緻的差異創造風格化的系列品項，共構了一個快速的、多重的、雜揉的感官世界**。 (Appadurai, Arjun，2009。《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鄭義愷譯。台北：群學。)
- 本研究特別針對的帽子而言，如同 Crane（2000: 82）指出的，**帽子是 1960 年代以前西方男子最具秀異性的衣著物件**。相當程度上，這是因為它的價位適中，比起西裝和大衣更能提供一種理想的社會條件以消弭傳統的階級差異，同時又能夠彰顯特定的社會層級。
- 也因此，包括大甲帽或巴拿馬帽在內的草帽，**原物料雖然便宜，但是精巧細膩的手工技藝卻可以幫它加值，因此兼有平民商品與精緻佩飾的雙重性格**，誘惑著二十世紀初新興的消費社會，以及想望著用少量花費即可沾染現代性氛圍的「大眾」。 (Crane, Diana. 2000. *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北京奧運的身體與國體

楊瑞松 （政治大學歷史系）

北京奧運與「展示中國」

✱ 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ation)的話語權: 如何在此全世界矚目的節慶場合: 透過「身體」展現「國體」(national identity)

✱ 「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論述模式的陷阱: 本質主義(essentialism), 化約論(reductionism)

✱ “將「中華文明的傳奇」注入奧運歷史”

《香港文滙報》:〈中華文化完美融合奧運精神〉

✱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在展示中華民族悠久燦爛文化的同時，又充分體現「同一世界，同一夢想」的理念，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完美融合。這是中華文化光照全球的輝煌璀璨之夜，是中西文化交融匯集的激動人心時刻。源自西方的奧林匹克運動第一次來到中國，在人類普世價值中融匯了和諧、團圓、吉祥、生生不息等中華文化元素，極大地豐富了奧林匹克精神，為人類文明進步匯聚了更多的智慧。面對奧林匹克精神與中華文化的雄偉交匯，全球炎黃子孫為之欣慰自豪，五大洲不同種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們為之歡呼喝彩

王丹:〈奧運開幕式的人道主義缺失〉

✱ 與往屆開幕式不同，幾百名青春靚麗的美女在場內環繞一圈，組成了運動員集中區的外邊界，大概是為了體現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這些青春美女從希臘隊入場開始，就邊跳邊舞，微笑著向運動員揮手致意。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開幕式的設計者似乎沒有考慮到這幾百名美女志願者的身體和生理需要，讓她們整齊一律地在 30 度高溫中不停息地舞動了整整兩個小時。

同場異「夢」

✱ **“One World, One Dream”， “百年夢想”，“中國夢”**

✱ 夢想的核心:「和諧」社會，和平世界的建立----「天人合一」、「和為貴」

✱ 各族兒童攜手護衛國旗進場的方式，象徵中國國內各族和諧相處團結一致

✱ 另一方面，由童稚歌聲和可愛的身型所歌詠唱出的〈歌唱祖國〉，也以軟性的調性向世界傳達中國「和平崛起」的訊息。(通常都是以進行曲的軍歌型式來演唱，旋律的速度至少快上了一倍)

和諧聲下的 “緊張性”

✱ 獻唱的紅衣女孩並非是真正的主唱者，而僅是一位對嘴的替身

✱ 為求國家形象的完美呈現高於一切的考慮-----此項「犧牲個體，完成大我」的「作假」行為 vs.奧會精神強調以身體的真才實學來追求完美的準則

✱ 和諧主題 vs. 〈中華心民共和國國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cf. 1989 法國二百周年國慶調性)

文人文化與「再現中國」

✱ 以傳統中國的「文人文化」的若干特色為主軸。文人文化生活的要素：琴、書、畫之詩文傳統，透過不同形式的身體演出——例如在優雅的古琴聲中，以舞蹈家的肢體做為墨筆，完成大幅的潑墨畫作，或是以萬人操的表演型式呈現活字印刷術，強調漢字之美

- ✱ 做為奧會（以身體的肢體技藝能力追求展現人類美感經驗）的會前開場暖身表演節目?

近代中國的身體文化

- ✱ 現代體育活動在中國生根發展的種種論述，事實上往往建基於對於傳統文人文化的詩文傳統的尖銳批判上。
- ✱ 在晚清以降蔡鍔、梁啟超等人的「尚武」思想傳統，不僅傳統文人文化的各種文化實踐（琴棋書畫，舞文弄墨）被視為形塑現代中國身體的對立面，傳統「重文輕武」的文化價值更是被視為必須被揚棄改造的對象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

- ✱ 檢討何以中國傳統無體育活動, 首因為:

  "一則積習難返也。我國歷來重文，羞齒短後（重文輕武），動有好漢不當兵之語。雖知運動當行之理，與各國運動致強之效，然舊觀念之力尚強，其於新觀念之運動，蓋猶在迎拒參半之列。故不好運動，亦無怪其然。"
- ✱ 這一項歌誦文人文化的表演，居然是在所謂中國追求成為現代體育大國的「百年夢想」達成之際所演出的劇碼而言
- ✱ 這樣的「再現中國」方式不啻是對於近化中國身體文化史的一大反諷。或者說，在一片強調「和諧」氣氛中，傳統身體文化和近代中國身體改造運動和論述之間的種種矛盾和衝突，都被「和諧」掉了！

「百年夢想」vs.「百年國恥」

- ✱ "東亞病夫" (Sick man of Asia)一詞在全球華人文化圈中可謂耳熟能詳，作為西方國家強加給中國和中國人的蔑稱，專門用來諷刺中國人生理上的虛弱不堪，一直是國人難以磨滅的心靈集體創傷。.....於是"一雪前恥"、"摘掉洋人加在中國人的帽子"便成為國人的訴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風靡一時的電影《精武門》中，李小龍以剛猛的體魄、迅捷的身手，摧毀標有"東亞病夫"字樣匾額的場景，將這種訴求表現得淋漓盡致，成為華人延續至今的記憶。
- ✱ 而體育則成為國人向世界證明自己最好的利器，與民族的榮辱是密不可分的，以至於一枚金牌會令全體中國人為之振奮，一場足球賽失利又會令全國為之沮喪。可以說中國近代的體育史，就是一本辛酸的血淚史，而自強不息的中華兒女，用賽場上的奮勇拼搏，把這本辛酸史打造成了奮鬥史、成績冊。從賢人對體育的提倡，到學堂、學校裡日漸流行的籃球、足球；從初次參加遠東運動會的青澀，到日漸融入奧運會大家庭；從賽場上孤軍奮戰的劉長春，到一個個驕人的"夢之隊"；從百年前的奧運夢，到 2008 年北京圓夢；從"東亞病夫"刻骨銘心的恥辱，到笑傲世界體壇的揚眉吐氣，中國體育已走過百年路程。〈百年體育見證世紀滄桑〉

和諧 vs. 雪恥

- ✱ 相對於奧運開幕式上，處處以「和諧」定位中國完成百年奧運夢的說法，強調中國全國上下以歡欣鼓舞的心情參與奧運，上述引文中的「中國近代

的體育史，就是一本辛酸的血淚史」的行文中所透露出的悲情意識，尤其是開宗明義所提到的「東亞病夫」情結，恐怕才是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甚至包含中國政府本身如何真正定位看待北京奧運的歷史意義的關鍵因素。所謂「洗刷身體恥辱」、「雪恥」的復仇意識和使命，可謂由李小龍等「功夫英雄」傳承給在運動場上競技的選手，而奧運會場上的金牌演出無疑是此種復仇雪恥的最高表現。

〈東亞病夫〉情結

- ✱ 在中國，體育運動和民族的榮辱是那樣的密不可分，以至於一個金牌的獲得會令全體中國人為之振奮，一場足球的失利又會令全國為之沮喪。不要以此來推斷中國民族精神之脆弱。**實在是「東亞病夫」的帽子在中國人頭上壓得太久太久，中國人去除侮辱的夙願積澱得太深太深**《文滙報》

高翠《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

- ✱ 北京申奧成功，不僅反映了我國的體育水平的整體提高，具有舉辦大型國際體育競賽的承受能力和組織才華，而且說明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華民族徹底把“東亞病夫”的屈辱拋向了汪洋大海，**幾代人夢寐以求的體育強國如噴薄中冉冉升起的的桅杆，必將在霞光萬道中，展露雄姿，矗立在世界東方！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劉鵬:〈新中國體育 60 年: 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大國〉2009 年

- ✱ 舊中國競技體育水準低下，三次參加奧運會均空手而歸，被蔑稱為「東亞病夫」。新中國成立後，為提高我國的體育運動技術水準，努力攀登世界體育高峰，我們進行了長期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奧運會為最高層次的競技體育發展戰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幾代運動員在強手如林、競爭激烈的國際賽場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東亞病夫」的「誕生」

- ✱ “百年國恥”的要角:東亞病夫
- ✱ “中國人體質急轉直下，是西方列強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罪惡地向中走私鴉片，並用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從而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導致了上至皇清國戚，高官顯貴，八旗綠營兵丁，下至庶民百姓，吸毒成癮，不能自拔，使國運陷入萬劫不拔的深淵，使國人的體質遭五藏俱毀而不見血的摧殘，自始蒙「東亞病夫」的屈辱稱呼。” 高翠《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

Long Live the Sick Man!

- ✱ 「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公共記憶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因為如果說洗刷百年國恥是所謂完成奧運百年夢的重要動機，那麼做為標記百年國恥的重要印記之「東亞病夫」自然不可能輕易退出歷史記憶舞台。
- ✱ 相反地，「東亞病夫」需要不斷地被召喚，方才能一方面激發群眾的悲情，強化其集體身體受辱意識，另一方面形塑灌輸只有「新中國」的建立方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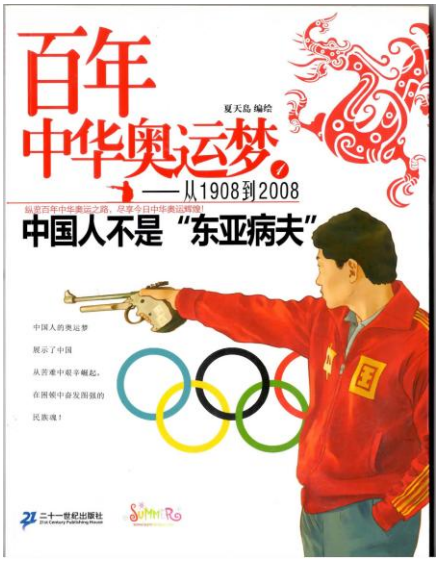
能雪恥的歷史記憶。

✱ 東亞病夫的「前世今生」-----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17-67。

北京奧運：和諧之場？雪恥之域？

✱ 1. 這一場盛會是中國官方精心要營造中國處處「和諧」景象。不論是中國現在內部的族群關係，或是和傳統歷史文化的傳承關係，以及中國對外在世界的相處哲學，都是「以和為貴」的哲學主導。在溫馨歡慶的「再現中國」的過程中，在所謂追求百年夢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的所有和過去傳統文化的緊張性關係的歷程，例如身體改造論述，以及五四和文革時期的激烈反傳統運動等等「不和諧」歷史片段，都退出了這場「再現中國」的舞台。

✱ 2. 相對於開幕式一開始所標榜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好客熱情，「洗刷東方病夫」的情結，雖然暫時從正式的「再現中國」舞台上消失，卻始終是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熱情關切這一場身體競技大會的主要動力。

✱ 來自官方或民間的各類論述，不時召喚此一被視為是代表近代中國人集體身體受辱的符號，以強調北京奧運的重要意涵。中國的運動選手除了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選手一樣，肩負著奪取金牌以榮耀其國家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身體表現更有承擔洗刷歷史身體恥辱的重責大任。他們的優越表現（金牌數世界第一），更是被宣揚為「新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方能完成百年夢想，洗刷百年國恥的最佳見證。

✱ 3. 這一場由無數的現代中國人身體在幕前幕後、台上台下所編織完成的各種美夢（百年中國夢，全人類和平共存之和諧夢，洗刷百年之恥之夢）也呈現了由中國官方所主導（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獲得許多中國人支持）的現代中國自我言詮。它其中所包含的曖昧性和弔詭，它所刻意營造的認同和有意無意淡化遮掩的歷史之間的張力，有待日後更進一步的「夢的解析」。